

祛除虚火,让艺考回归正常轨道

□ 聂书江

最近几年,随着艺术市场的火爆,艺考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据统计,2020年,全国艺术报考人数多达117万,较2019年大幅增长了13万人。在此背景下,不仅考生备考、应考负担加重,而且高校考试规范也面临很大压力,管理宽松软、辅导培训失序与违规等问题频发。

为此,日前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2024年,我国要对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制度和艺术人才选拔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改革。

从舆论反映看,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到文化课成绩比重上。一些观点认为,文化课比重提升会遏制艺术热情,让有潜力的艺考生望而却步;还有观点认为,文化课比重加大会削弱艺术专业水准。

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艺考文化课在艺考录取中的比重一直在提升。很多艺术高校已经在招生简章中明确强调文化课与艺术专业之间的比重。比如上海戏剧学院,早就要求文化分需要达到一本线,同时一些单科成绩还不能低于105分(150分制)。中央戏剧学院也是如此,它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最低录取比值达到了1.09,按高考文化课成绩与一本线比值从高到低录取,同时还要求语文、英语单科成绩须达到该科目满分的70%。

也就是说,此次艺考改革在文化课的规定方面并非从零到满,实际上是对既定事实的确认,艺术考生对于文化课比重加大应早已有心理预期。

从社会宏观角度看,艺考改革一定程度上对校考虚旺起到遏制作用。近年来,随着艺术人才需求的火热,很多高校都竞相开办了学费标准相对较高、办学门槛较低的艺术类专业,甚至盲目扩大艺术类专业招生规模,比如全国组织校招的高校有300多所,而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人数在全国本科招生总数的占比中也位居第三,仅次于工学和管理学。

然而,由于办学定位不明确,招生规模及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一些

艺术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从而影响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前景。而本轮改革中的扩大省级统考范围、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量等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艺术校考的虚火,让艺考回归到正常轨道。

从微观的角度看,艺考改革阻断了不切实际的艺考捷径梦。过去,由于艺考需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从事专业练习,文化成绩要求一直低于普通专业考生,使得部分考生和家长存在着错误观念,认为艺考招生重专业轻文化,将艺考作为自己到更好大学念书的升学捷径。

艺考文化成绩要求相对较低,本是他们要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在专业训练

上导致的结果,而不应成为其选择艺考之路的原因。如若因果倒置,实非教育公平之本意。本次改革明确对艺术类专业进行分类录取,尤其是针对一些不需要参加考试的专业,直接根据高考文化课成绩进行择优录取,从而摒弃艺考捷径路快速明星梦等浮躁心理,让艺术教育更加公平和扎实。

从我国艺考的发展历程,以及艺术生就业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本次艺考改革不但不会给考生带来阻碍,反而会让艺考回归到培育德艺双馨人才的道路上去,为真正有才华的青少年走上艺术殿堂保驾护航。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传播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网络平台怎能随意贩卖处方 失眠药

□ 朱昌俊

最近有媒体报道:在二手网络交易平台,有人以卖助眠药为名,销售管制类精神药品。买卖双方取得联系后,卖家会发来一个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商品,往往是普通商品链接,但售价却是三唑仑、地西洋等药物的10多倍。三唑仑、地西洋用于治疗失眠、焦虑,但其实很多管制类精神药品,滥用后也可以成为毒品。目前国家规定的相关药品一共430多种,其中有精神抑制类、麻醉类等,必须由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开具处方才能购买。(央视网9月27日)

药品销售本就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作为管制类精神药品,更不可以随便买卖。而在一些二手网络平台却可以随意买到精神抑制类、麻醉类等药品,这显然突破了药品销售管理规定,也蕴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

根据专家分析,在网络上购买管制类精神药品的,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不正当牟利,把它当做毒品使用。如媒体梳理统计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信息发现,2019年8月至今年8月,两年间共有231起涉及走私、贩卖常见一、二类精神药品的刑事案件宣判;另一种则是出现了精神上的焦虑症状,但因种种原因而未接受正规治疗,却选择自行购药服用的群体。这同样非常危险,不仅存在安全隐患,甚至还可能形成药物依赖,导致成瘾。

因此,无论是从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角度,还是从确保精神疾病群体用药安全的角度,都绝不能纵容精神类药物在网络平台上被随意销售的乱象。一方面,相关平台应该强化对于违规违禁品销售的封堵力度,加大审核和干预,最大限度压缩违规销售药物的网络空间。同时,也应该和相关执法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及时根据网络线索顺藤摸瓜,共同打击违规销售药品的网络黑产;另一方面,针对部分精神疾病群体的用药安全问题,也应该加强科普宣传和相关医疗服务建设,进一步满足正常的治疗需要。

据世界卫生组织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3.5亿人罹患抑郁症,近10年来患者增速约18%。根据估算,目前我国泛抑郁人数接近1亿。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对于精神药物有着不可小视的刚需。但是,由于对于精神疾病缺乏科学认知,或是担心被歧视,相当一部分患者都选择私自购药服用,如此前有统计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正确就诊率不足10%,这无疑为违规销售精神药品的网络黑产提供了市场。因此,要彻底遏制网络违规售药行为,从源头减少一些患者的用药和就诊误区,也是必不可少的配套工作。

对此,首先需要加大对于精神疾病的社会科普力度,以在提升患者科学认知的同时,也减少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歧视与误解,真正剔除患者正常求医问诊的社会压力。其次,则要有效增加精神疾病医疗资源方面的投入。有数据显示,中国精神科医生缺口达到40万人,且多数医院都未开设相关精神疾病门诊,这无疑增加了患者的就医难度,也在客观上将不少患者推向了私自购药服用的危险境地。

如今,相当一部分精神疾病患者的正常治疗,仍处于不被看见和正视的状态,乃至他们的用药都是求助于地下灰色市场。要真正遏制这个庞大的灰色市场,在打击、规范的同时,更要让精神疾病患者能够真正走到阳光下,不受压力地、便利地问诊求药。要实现这一目的,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 赵清源

近期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零星散发,旅游业受影响明显,但研学类旅游产品却异军突起。携程旅行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人数同比增长超650%,亲子游订单中研学类产品订单占比近七成。随着双减政策落地,中小学生学习时间得到进一步解放。作为一种集研究性学习与旅行体验于一体的校外活动,研学旅行市场走俏迹象明显。与此同时,专业人士指出,国内研学旅行市场质量及服务标准还有待提高。(《工人日报》9月26日)

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明确要求逐步推行中小学生学习研学旅行。此后,作为一项推动素质教育改革的杠杆举措,研学旅行市场走入人们的视野。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银发低头族

□ 夏熊飞

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其中60岁以上网民占比达12.2%,约1.2亿人,银发低头族比例不断上升。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摸向枕边的手机,不玩手机比少吃顿饭还难受成为他们的真实写照。(新华社每日电讯9月28日)

漫画 徐简

婴幼儿照护费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以缓解生育后顾之忧

□ 夏熊飞

9月27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其中提到,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住房等方面支持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在生育保险制度较为普及完善的当下,生不起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不过,有人为父母经验的人肯定深有体会,相比于生娃,养娃是项更耗时耗力耗钱的艰巨任务。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尤其牵动新手宝妈宝爸们的心,甚至成为不少年轻人生育二孩、三孩路上的心理与经济障碍。

相比传统社会的隔代照护,随着流动人口的不间断增大,越来越多家庭开始将婴幼儿送入托育机构,或者聘请专业的育儿嫂居家照护。可无论哪种形式都价格不菲。据报道,北京专门的托育机构收费约为7000元一个月,如果有户外

活动场所,价格还将上浮3000元,达到一个月1万元。在上海、南京、成都等地,民办托育机构的收费标准,也保持在这个水平。多数地区聘请育儿嫂照护,费用往往也不会低于夫妻一方的工资水平。

在养育3岁以下婴幼儿的过程中,除了奶粉、尿不湿、医疗等常规开支外,照护服务费用所占比例不容小觑,对大多数普通家庭是笔不小的负担。纲要要求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对广大家庭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不仅有利于减轻照护费用负担,更能实现生育、养育、教育各阶段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全覆盖。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目前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方面,扣除范围从学前教育一直到博士研究生教育,子女从3岁到30岁的教育差不多都涵盖了。如今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也纳入其中,正好弥补了0到3岁的年龄段空白。

不过,减税虽然诚意满满,但金额毕竟有限,相较于不菲的照护费用,更有杯水车薪之感。在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中,除了费用高外,还存在着托育资源供给不足、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

目前,全国现有0-3岁的婴幼儿4200万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但现在的实际入托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很大。随着三孩政策的进一步落实,这样的供需缺口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因而,除了相关减税政策外,未来需要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把数量提上去、价格降下来、质量强起来,让有入托刚需的家庭能够放心将婴幼儿入托,又不至于增加太多的照护费用负担。

与此同时,国家也可以鼓励用人单位以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方式,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以及在政策、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吸引更多力量进入托育行业,为婴幼儿的照护服务提质降费,切实减少有生育意愿家庭的后顾之忧。

双减下的研学热:别把研学当旅游

□ 赵清源

的意见》,要求各中小学要把研学旅行纳入教育教学计划,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促进研学旅行和学校课程的有机融合。至此,研学旅行由原先的校外活动上升到校内课程。

研学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一种创新形式,通过唤醒学生对不同文化和体验的意识与感受,帮助学生从新的角度看待世界。开展研学旅行,有利于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深度融合。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研学旅行淡化了教育性和实践性,几乎等同于春游、秋游及夏令营活动,使研学类旅游既少研,也不学。

研学旅行重在研学,而不是旅行。研学是研究性学习的简称,是一种用问题驱动和探究过程的开放式学习,说到底是一门实践的艺术。传统的学习观重在知识的输入与产出,追求知识的传授,而研学重在知识建构的过程,在这样的学

习过程中,教学不再是解读教科书然后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为学生创设一个情境让学生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去认知世界。

目前的研学旅行大致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学校组织,在研学开展之前,由教师和学生确立研学主题,并让学生组成研学团队自主设计旅行路线、交通选择、食宿以及安全等问题,这种占极少数。第二种是由旅行社或研学旅游公司完全代替学校来设计路线和方略,并组织学生的研学旅行活动,这种占大多数。这就是说,研学旅行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学旅行公司开发的产品质量以及活动实施的效果。然而,现实中旅行社开发研学产品的绝大多数是非教育类相关专业出身,因此导致研学产品缺少应有的教育意蕴。

要让研学旅游回到教育的本位意义,教育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相关政策,推进研学旅行的课程化,必须制订具体的研学旅

行课程实施计划,以及课程的特征、性质、目标等,编写相应的课程标准,改变研学旅行随意性和无序状态。与此同时,还要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把研学旅行课程总目标分解成年级阶段目标,设计与制订实施方案,做到各阶段研学旅行目标内容与组织实施相互衔接,细化年级研学旅行课程标准、内容、途径,建构学校研学旅行课程体系。相关部门还应当根据研学课程的标准,审查监督市场上的研学旅游产品,是否符合相关政策。

同时,为了保证研学旅行有效开展,还应当制订严格的考核方案,对研学旅行的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和考核。从学校、学生、家长和社会等不同方面收集信息,以形成全面客观评价,重点关注学生在研学旅行过程中的体验与感悟,对研学旅行结果,心得进行价值判定,对研学旅行总结进行检测,以便进一步优化研学旅行,以促进研学旅行有效开展。

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达6.8% 别低估了情绪感冒

□ 杨鑫宇

近日,一项发表于《柳叶刀精神病学》的国内研究引发广泛关注。该研究发现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为6.8%,其中抑郁症为3.4%。在这些抑郁障碍患者中,仅有9.5%的人曾接受卫生服务机构治疗,得到充分治疗的只有0.5%。这一系列数据呈现出的精神健康图景,令人担忧。

提起抑郁症,大多数人都不陌生。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听到我抑郁了之类的说法,在互联网上,网民对自身抑郁情绪的表达更是司空见惯。然而,泛化的抑郁表述,并未让公众充分意识到抑郁障碍与抑郁症的高发趋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概念脱敏,以为抑郁不是什么大事,甚至将抑郁障碍和心情不好混淆起来。不乏有人带着揶揄,将网上的抑郁表述调侃为当代网友人均抑郁,认为抑郁障碍的严重性被高估了。

抑郁障碍的严重性被高估了吗?从相关结论看,答案是否定的。6.8%的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意味着每个人的周围都可能有人患病。但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身边的抑郁障碍患者,似乎凤毛麟角。家人、朋友、同事、同学患上抑郁症,往往被当成稀奇事和倒霉事。调查得出的数据与人们的一般印象并不同,这说明,抑郁障碍的严重性,恐怕处于被社会普遍低估的状态。

对抑郁障碍和抑郁症,不少人的理解都是望文生义,以为抑郁障碍或抑郁症等于心情抑郁。基于此,他们很可能低估抑郁障碍对个人健康的伤害,甚至把患者的痛苦当成不够坚强的表现。事实上,抑郁障碍是一种

高发率、高复发率及高致残率的慢性精神疾病。卫健委发布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年版)》显示,抑郁障碍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和行为改变,部分患者存在自伤、自杀行为,甚至因此死亡。从专业定义上看,抑郁障碍无疑构成严重的健康风险,其危害远不止心情抑郁这么简单。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对抑郁障碍的认识陷入另一个极端。在这部分人看来,既然抑郁障碍是一种病,那就只有医院诊断了才算。因此,那些心境低落、身心不适,怀疑自己患有抑郁障碍但未经确诊的人,是矫情装病。

然而,正如研究调查显示的那样:当下,接受卫生服务机构治疗的抑郁障碍患者连一成都占不到,余下的九成多患者都是卫生服务未能覆盖到的隐数。这种现象的成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卫生服务机构诊疗手段不够先进、社会宣传不够到位的因素,也有患者本身对相关知识了解不足,或是出于社会偏见,不敢、不愿不知道就诊等因素。贸然对那些存在抑郁障碍的人品头论足,甚至口出恶言,既显得很礼貌,也可能对真正的抑郁障碍患者造成二次伤害。

面对身边的抑郁障碍患者,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不至于好心办坏事。患者所面对的是一种疾病,很难只靠乐观坚强走出困境,我们要理解他们的痛苦与不安,而不是以自己的标准和主观感受妄加评判。

我们也应更多关注那些隐数的存在。不管是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是自己,持续陷入情绪感冒,有疑似抑郁的倾向,就要高度警惕,及时寻求专业的诊断和干预。

追回流失海外的国宝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 范星盛

近日,国家文物局成功追回一批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该批文物被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查获,在文物局组织鉴定后,确定为非法流失文物。经与美方交涉和追索,文物已全部被返回回国,并将整体划拨给西藏博物馆。

文物回家让人分外暖心,背后是百年前旧中国令人心痛的文物流失史:被盗掘一空、文物流散全球的洛阳金村大墓,被切块破坏、私运出境的晋化寺藻井,被盗割毁损、千疮百孔的天龙山石窟,分别代表了古代墓葬、文物建筑、石刻构件等流散境外的不同文物类别。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天龙山石窟佛首、青铜虎鎣、大堡子山金饰片等重量级文物经追索回国,回归之路焕然一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成果展惊艳亮相,我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也引发我们关于如何更好地推进相关工作的思考。

跨境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与国际文化遗产条约机制密切相关。作为文物大国,我国有关方面应当继续积极主动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从多角度、多面向开展国际合作,推动建立有利于打击文物走私、助益文物返还的国际法秩序。如我国在助推1970年公约、《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等国际条约改革完善工作中的长期努力,已经在与多国对接的文物追索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果。

国际法研究和国际组织人才是相关工作的关键力量,也是当下较为稀缺的文物涉外工作应用型人才。应当鼓励有条件的综合性高校,探索建设融合法学、考古文博、外国语、国际关系等专

业方向的复合型国际法律规研究人才培养体系。同时积极为青年人才到相关国际组织实习和工作铺路架桥,增强我国在该领域的话语权,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

中国力量。

文物追索工作也要在源头上遏制文物流失,切实加强国内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既有百年的历史问题,也有至今仍存在的文物盗掘和文物走私等现实问题。在部分地区,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盗窃、盗卖文物的现象屡有发生,安全管理的漏洞十分突出。值得注意的是,文物安全不仅是文物部门一家的工作,公安、海关、城乡建设、自然资源等部门均当守土尽责,与文物部门形成保护合力。

在各类文博单位中,古代墓葬往往集中埋藏丰富文物,是文物犯罪和走私的主要目标,但由于相关文物深埋地下,分布广泛,在保护和管理上向来存在难度。对此,应当进一步压实属地文物管理主体责任,织牢织密文物安全网络,吉林、内蒙古等地对文物长制度和文物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体系的探索,在制度上斩断文物流失源头提供了有力保障。

文物追索工作还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国家典籍博物馆曾主办《凡是我宝,都要争取》郑振铎等抢救流失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纪念专题展览,展示了郑振铎先生和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间的往来信函和单据,见证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积极联络、集聚各地爱国人士,抢救流失文物的感人事迹。文物回归事关全体国民的文化财富,团结各行各业、各领域的爱国力量共同参与追索工作,将有助于激发全社会的爱国热情。对此,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或应建立一条综合性博物馆,为集中保管和展示追索返还文物创造必要条件,发挥回归文物在公众教育中的独特作用。